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集刊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李志农 朱凌飞

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第19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集刊



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第19辑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李志农 朱凌飞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19辑 / 何明主编.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 - 7 - 5482 - 2570 - 6

I. ①西… II. ①何… III. ①少数民族—西南地区—
年刊 IV. ①K280.7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2324 号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 19 辑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李志农 朱凌飞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封面设计: 刘文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制版印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2570 - 6

定 价: 58.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65031071/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871 - 65033247)

全球化·社会适应·文化整合：东亚移民的人类学研究 ——第四届东亚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5年9月23日至24日，第四届东亚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邀请到了来自日本山口县立大学、山口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东京都立大学，韩国汉阳大学、亚洲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大学的二十余位学者。研讨会开幕式由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李志农主持，日本山口县立大学教授Yuji Ankei和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何明致开幕辞。何明院长代表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欢迎与会学者的到来，Yuji Ankei教授期待各国学者对东亚移民问题能有更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全球化·社会适应·文化整合：东亚移民的人类学研究”，会议共分四组讨论。第一组由云南财经大学的陈刚教授主持，Song Doyoung教授、Yuji Ankei教授以及何明教授依次发言。来自韩国汉阳大学的Song Doyoung教授对居住在首尔的外国穆斯林移民进行了调查，通过运用“跨国社会领域”概念进行分析，认为外国移民试图从国际移民政策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学者Yuji Ankei教授的研究主题是对日本强制性移民所引发悲剧的思考。低地珊瑚岛Hateruma上的居民被政府和军队强制迁移到人口稀少的高地Iriomote岛，由于未考虑本地居民已有的如何处理海啸、滑坡等自然灾害的知识，导致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感染疟疾而死亡。何明教授以中国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区之一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缅甸籍移民为例讨论了跨国移民社会适应与文化融入的条件，认为国家制度、移民群体、移入社会是最为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

第二场研讨由来自韩国亚洲大学的Yang Han-Sun教授主持，陈刚教授、Kawakami Sachiko教授依次发言。陈刚教授的研究对象是位于老挝北部的一个华人企业Yun公司，此公司由中国政府资助，于2006年在老挝北部的一个橡胶农场建立，主要从事将当地鸦片生产转变为多样性的商品作物的替代种植。他认为跨国公司应处理好与当地文化、居民的关系，需将公司管理与当地文化特点结合起来。来自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的Kawakami Sachiko教授考察了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日本城的韩国人，她主要研究了在后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背景下此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活动。



民族研究院何明院长致辞

第三场研讨由Song Doyoung教授主持，Yang Han-Sun教授、郭锐教授、Ankei Takako教授、张玉玲教授依次发言。Yang Han-Sun教授调查了在韩国工作的中国朝鲜族群体，其关注焦点是由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跨国移民的增多，公民概念受到挑战。“文化公民”所强调的不仅是国际移民和少数民族对于法定身份和权利的争取，更包括在群体中被认可。来自贵州师范大学瑞士研究中心的郭锐教授主张从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差异、族群诉求以及国家认同的历史。日本学者Ankei Takako教授考察了移居非洲的农民将木薯带到了新的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中，通过发酵和中和作用使得价格低廉的木薯缓解了非洲因急剧增加的人口所带来的粮食问题。来自日本山口县立大学的张玉玲副教授调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住在日本神户的中国福清人。不同于居住在日本的其他中国群体，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儒家伦理，居住在神户的老一代福清人和年轻一代福清人相互帮助，支持彼此。

最后一组研讨由Yuji Ankei教授主持，分别由来自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阿部朋恒、来自云南大学的张振伟、陈劲波、李伟华依次发言。阿部朋恒在云南哈尼族社区考察了新农村建设对当地人的影响。他认为“美丽家园”项目的建设使得过去以村庄为单位生活的人们，其社会关系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张振伟调查了进入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勐龙寺庙的缅甸和尚，他们的进入使得当地的亲属关系以及社会系统重新得到了整合。陈劲波以广西省东兴市为例，讨论了中越边境的古船木家具贸易，通过调查他发现古船木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李伟华考察了位于中缅边境的双重出入管理系统，分析了跨境的景颇族如何理解左米亚人以及景颇族如何将“民族国家”的概念融入了自身的历史和传统。

研讨会围绕着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所引起的社会适应与文化整合进行了重要的讨论，每组发言结束之后，学者们对不同的研究提出了颇具价值的问题。最后，何明院长对本届东亚人类学研讨会做总结发言，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并对所有与会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第四届东亚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

作者：贾超芝杉



上图：与会代表合影/下左：会场讨论/下右：发言与讨论

主 编：何 明

副主编：李志农 朱凌飞

编委会

主 任：林文勋

副主任：刘世哲

委 员（按姓氏排名）：

Chayan（泰国清迈大学） 陈庆德 高丙中 李东红 麻国庆 马翀炜
彭静莲（比利时鲁汶大学） 王文光 徐黎丽 杨 毅 袁同凯 周 平
周永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目 录

☆ 边疆研究

陆边民族地区会计文化的近代转型

——基于云南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赵晓荣 (1)

国家和地方利益博弈中的移民身份

——缅甸掸邦第四特区的中国橡胶移民个案研究 张雨龙 (11)

跨境民族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与社会秩序建构

——以云南为例 保跃平 (20)

从《东方杂志》看民国学人对西南边疆问题的认识 王振刚 李吉星 (31)

从元代安南纪行诗看中越文化交流 张建伟 (41)

☆ 民族发展研究

定居、农牧并行与牧区景象

——基于新疆昌吉牧区的调查研究 聂爱文 赵 斌 (47)

旅游移民社区文化建设与城市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丽江大研古城的调查反思 桂 榕 寸 炫 (56)

迪庆藏区藏汉双语语言态度初探

——以迪庆藏文中学为例 王仲黎 拉茸追玛 (64)

云、贵、川三省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测量及提升路径研究 朱 沙 李双琦 (72)

☆ 民族政策研究

法律缘何难上山 张剑源 (81)

投桃报李：红军长征途经四川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效 冯 兵 (90)

☆ 民族史研究

夏商周时期的边疆民族 陈 燕 尤伟琼 (99)

从清代档案管窥大小金川土司社会状况	王惠敏 (108)
-------------------------	-----------

清代贵州历史民族图志对比研究

——以康熙《贵州通志》、乾隆《皇清职贡图》、嘉庆“百苗图”为中心

.....	李胜杰 马国君 (116)
-------	---------------

历时与共时的并存

——唐宋时期僚人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

李艳峰 (126)

南诏户籍制度研究	牛 坤 李东红 (134)
----------------	---------------

☆ 民族艺术研究

西双版纳傣族竹编制品的功能及其文化意义研究	金少萍 韩园园 (140)
-----------------------------	---------------

侗族河歌的生发历程研究	胡 牧 (151)
-------------------	-----------

☆ 族群问题研究

杂居村落中的族群关系研究：以漾濞县抱荷岭行政村为例	陶 琳 (160)
---------------------------------	-----------

中介群体与新疆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建

——以和田市古江南苑小区汉族春节族际网络为例

吴良平 龙开义 (171)

☆ 宗教人类学研究

仪式行为象征空间对建筑艺术构形的影响

——以藏族叩拜、转经仪式行为为例

刘 朦 (181)

信仰的集结与共生

——咱河土家族村民间信仰的多元格局与城市化境遇

张 晗 (190)

陆边民族地区会计文化的近代转型

——基于云南的历史人类学分析^①

赵晓荣*

摘要: 中法战争后云南境内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滇越铁路的开通,给云南民族会计文化带来刺激和冲击,迫使其步入艰难的近代化转型。但是外楔性的资本主义会计文化因素并没有冲破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也无力改变互惠经济和宗法秩序,更没有撼动传统的文化惯习。从人类学的整体论观照,近代云南会计文化无论是从物质、制度还是观念方面都没有完成转型,而是嵌合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带有明显的社群特征:在物质维度体现为取法自然,在制度维度体现为中体西用,在观念维度体现为多元复合。

关键词: 近代云南;民族会计文化;簿记;惯习;社群

DOI: 10.13835/b. eayn. 19. 01

中国的陆地边疆一方面远离中央相对落后,一方面又与国外接壤常会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陆地边疆地区在近代以来总是处于中外文化的急剧冲突、交互和融汇之中,这种表现在云南尤为突出,而会计文化的近代转型就是这种表现的一个断面。本文所指的会计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会计人员的价值取向、信念追求、文化修养、物质手段、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等为主要内容,并在相应的物质、制度和观念这三个层面所表现出的文化,是人类在长期会计实践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属于特定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亚文化,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本文对陆边民族地区会计文化的近代转型的研究,是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历史学的文献研究方法相结合,将“会计—社会—文化”之间在历史演变中相互不断联系的过程,放在人类学整体观的视野中探析和寻绎。云南少数民族会计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开启于1883年的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滇越铁路的开通,西方会计文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进入云南,给云南民族会计文化带来刺激和冲击,迫使其步入艰难的近代化转型中。这个转型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的外楔性,主要表现为缺乏内部自发型构的物质技术、资本、观念、人才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它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从西方引进的会计的物质技术、制度规范和观念文化这些因素只为近代云南民族会计的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这些外楔性的资本主义会计文化因素并没有冲破传统的乡土社会结构,无力改变互惠经济和宗法秩序,更没有撼动传统的文化生存图式。从整体来看,近代少数民族地区会计文化无论是从物质、制度还是观念方面都没有完成转型,还徘徊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在物质维度体现为取法自然,在制度维度体现为中体西用,在观念维度体现为多元复合。

* 作者简介:赵晓荣,云南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博士。

①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3BMZ061)的资助。

一、取法自然的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指的是“人地关系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涉及的主要是技术文化的层面，指的是一个民族适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可表现在该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直观地观察到”^①。物质文化作为会计的技术文化层面，在近代云南少数民族的会计实践中不仅是适应自然环境的物质方式，而且镶嵌在社会结构中，不仅具有可观察性，而且具有意象性。近代云南少数民族会计的物质文化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从外部环境看，云南近代化的历程开启于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滇越铁路的开通，不断冲击着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为数不少的人口投入商业城市，其中不仅有弃农就商的地主，也有失去土地的农民，昆明、宜良、开远、碧色寨、河口等地也就这样日益繁荣起来了”^②。这些通商口岸和滇越铁路沿线的城镇由于对外商贸的繁荣而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会计物质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由于这种冲击和影响只是局限在这些商贸繁荣的城镇地区，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贸易还很落后，会计的物质环境和设施还很薄弱，西方资本主义的会计物质文化很难进入。从内部因素看，近代云南社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两极：以昆明为中心的城市工商业中心、通商口岸和滇越铁路沿线的城镇为一极；这一极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它带来的新经济商贸的因素推动了会计物质技术手段和设施的发展；而另一极是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山区和半山区，仍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会计物质文化深受自然环境和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变迁非常迟缓。施坚雅认为近代云南基本是农业社会，“农民人数，在全省人口总数中，除昆明市及个旧、建水、河西（现通海河西镇）、石屏等县，因特殊情形农民人数成数较少外，其余各县，大抵均占90%以上；而边区各县局，竟占99%”^③。施坚雅所指的昆明市及个旧、建水、河西、石屏等县受商品市场网络影响的也只是滇越铁路沿线的一些地区。而从城乡整体看，西方资本主义的科技文明并没有改变近代云南传统的社会结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才开始萌芽，小农经济的自足性和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使其对外部物质文化的冲击和压力的反应相当缓慢。因此，会计物质文化在近代转型非常艰难和迟缓，还是沿袭自然法则。人们在实践中采取自然界提供的资源和物质作为计量手段，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性。其具体表现在生活、生产、交换、商贸等的会计活动中灵活地运用着麻绳、牛皮绳、谷物、苞谷、木片、豆子、竹箩筐、树枝、草秆、茅草、木斗、石头、手臂、手指、脚趾、纸簿等多种计量工具。

这种取法自然的会计物质文化，具有概算化和善巧方便的特点：“一方面是他们进行记数与记事决不脱离具体的事物，另一方面他们也必然是在其所处的环境之中去寻找可以帮助自己记数、记事的载体。——如用石子与石片，只要能随手取得，简便易行即可。”^④如傈僳族、彝族等民族既会用石头、苞谷记账，也会用手臂、手指或者脚趾计数；独龙族不但用石头、苞谷，而且也同佤族人一样用木刻，他们在“需要杀牛祭鬼，可向有牛的亲友借来杀，——并刻木为记，按习惯每年利息一拳。办法是用一根绳子量牛的胸围，然后将量好的绳子对折，再用拳头来量，看有几拳，如有五拳两指，则在木杆上刻五道长痕，两道短痕。木刻存放在头人家里，明年要还一条六拳零两指的牛，如超过或不敷这个数目，双方可用粮食找补”^⑤；苗族一般是用木头制成大小不等的四方形的木斗来计量或记账；基诺族习惯用刀在竹片上记账的方法简称刻竹，“如米、鸡、蛋、茶盐、银子等。按品

① 潘守永：《物质文化研究：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

② 李埏：《滇越铁路半世纪》，《云南日报》1957年4月1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

③ 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④ 郭道杨：《会计史研究》（第一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⑤ 云南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丛刊——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类和数目,用刻竹记录下来。村社中有专人专管这些刻竹,分类捆成一捆一捆。每家床头也有若干竹刻,既是‘记事簿’又是‘账本’”^①。在近代,云南各民族大都根据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经济交换活动就地取材使用这些实物记账工具,很少用纸簿,只在本村社、本族群与外村社、外族群的一些大型的会计活动中才会用纸簿。据昆明子君村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账房先生的94岁的彝族老人李昌明回忆说,从他师傅的师傅那一代到他这一代,都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会计的方法和技术。作为村里的账房先生,基本都是用民间的这些记账工具,而且并不太注重记账的精确,而是大概地粗算,毕竟都是族里乡亲,所以很多时候是口头契约。只有在本村、本族集体对外有大的买卖或交换时,才会用正式的纸簿记账。^②如今,这种正式的纸簿记账的历史遗存已经很少能找到了,即便在云南省古籍办找到的一份立于1899年的纸簿合同文书上所用的文字也不是彝文,而是汉文。因此,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交换中对会计进行管理和实践,形成的会计物质文化是概算化和善巧方便,虽然在具体的物质形式、内涵、计量功能上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取法自然”的特点。

云南民族会计物质文化在近代转型中体现了很强的内向性、自洽性和稳定性,深植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习俗,依托于人地关系。这种取法自然的会计物质文化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范畴的货物交换、商品交易所采用的物质资料和技术手段,也并不一定是基于经济理性所选择的会计物质方式或手段,还体现为少数民族人们对会计活动紧密相关的生产和生活的经验认知框架、情感体验和生存性智慧。由此可见,一切物质现象,其背后都蕴藏着某种社会结构。会计物质不仅仅是客体和手段,具有计量和实在性,并且是一种表述体系,具有叙事和象征性。表现为将物作为社会结构、经济手段和社会的整体关系的组合。物质文化中的物并不完全是为了追逐资本和利润,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它负荷着情感、信仰、互惠意识和道德,具有社会属性。在此意义上,取法自然的会计物质文化是近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社会生产和生活模式的积淀或形塑。

二、中体西用的制度文化

诺斯认为:“制度是指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传统、习惯等形式存在的非正式规则交错构成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及其实现机制。”^③在他看来,在传统社会,习俗和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调整和约束的作用,作为“共同的经验”使得“人们在每天进行交换时不用随时随地精心思虑交换条款”^④。中法战争之前,云南民族地区一直没有一套统一和完整的正式会计制度,大多数的手工业和商号沿袭传统的中式簿记的习惯,采取“收付式”或“入出式”单式记账方法。这种传统中式簿记成了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会计活动的一种规制,一种纽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种簿记制度在中法战争之前一直是单极演进。中法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省际和国际间的对外贸易频繁,滇越铁路成为联通云南与西方世界商贸往来的大动脉,西式簿记随之进入云南民族地区。

西方“借贷式”的簿记制度进入地域社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为了统一会计制度,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政府参照西方会计制度,颁布《借贷簿记法》和《会计师条例》^⑤,1930年按照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云南省政府颁布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推广借贷簿记法;并且鉴于清末以来云南

①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

② 笔者根据2012年8月27日访谈彝族老人李昌明的笔记整理。

③ [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5页。

④ [美]诺斯:《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参见[美]詹姆斯·A.道、[美]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发展经济学的革命》,黄祖辉、蒋文华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⑤ 魏文享:《市场、知识与制度:晚清民初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会计核算体系的混乱局面,云南省政府还颁布了《云南省财政厅会计规程》《记账规则》《云南省财政厅会计制度暂行章程》《各县财政局收支款项程序记账通则》《会计稽核人员服务规则》等多项会计法令和法规^①,这是自清王朝解体以来云南省官方第一次制定和统一会计制度。但是,这些正式制度在实践中推行起来却遭遇到困难,西式簿记不能为一般中小工商业主所认同,响应和效仿者寥寥无几。由于云南属于多山地区,近代铁路、公路沿线,以及对外通商口岸的城镇经济和山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西式借贷簿记制度仅仅应用于政府部门、银行业和外国资本控制的邮政、交通等行业,以及从事国际商贸的大型工商企业;而大多数的民族工商企业采用的是借鉴西方会计方法改良中式簿记,还有一些传统小商号和小作坊因为规模和资本很有限,因此还是沿用传统中式簿记。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具有稳定性,“即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人们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②,他还指出:“体现于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中的非正式约束与正式规则相比更难改变,它们把未来和过去连接起来,是理解历史变迁路径的关键。”^③从整体看,近代云南民族会计主要受非正式制度的规约,以中式簿记为体,西式簿记为用,体现了中体西用的特征。从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视角看,中式簿记制度文化和西式簿记制度文化不能说孰先进孰落后,各有利弊,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异在于制度的历史渊源迥异和制度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不同。

近代云南民族地区的一些小商号的资本和规模都较小,经营权和所有权不分,经济关系和管理层级简单,没有采用新式簿记制度的动力,因此他们沿袭了传统中式的单式簿记惯习。单式簿记组织由“草流、细流、总清”构成,账簿采用直式,“上记收下记付,用毛笔直行书写,不写阿拉伯数字,而使用一种传统的商用数码”^④。根据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发生一笔业务就登记一笔,只需记载现金的收付金额和事由,这种簿记一般被称为“流水账”或“花账”“草账”等。例如当时的白族庆正裕商号采用的是传统中式单式簿记,曾是庆正裕老员工的解乐三在《庆正裕商号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庆正裕的会计流水账制度:“由于组织规章,(庆正裕)较一般商号完善,会计核算,比较严密,如各分栈月报,每月照抄流水账,十天一结算,报告总号,借以考核各栈营业情况,调剂盈亏,开支无有浪费,或有无营私舞弊等情事,做到心中有数,防患未然,因而业务逐步开展。”^⑤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单式簿记制度具有简单实用和节省成本的优点。但是由于账簿简单,分类不明晰,标准不统一,不便于会计统筹,所以它与一些大的工业和商业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应。

当时云南许多规模和资本比较大的商号和票号根据自身会计发展的需求,采用徐永祚改良的中式簿记。这种改良是基于中式的会计制度,采借西方借贷式簿记的方法和措施,“对中国簿记之观念,为之一变,承认其尚有秩序的组织与一贯的账法,较之单式簿记,确为进步”^⑥。改良的方法是以中体为主,并辅之以西学。其沿用了中式的直式书写的账页和现金收付制度,采取复式记账法,用记账凭单代替流水账,账簿组织分为六类,主要簿有誉清簿和流水簿;辅助簿主要有认股簿、股东分红簿、薪工簿等;科目分为财产类和损益类,并且“改良中式簿记对于账簿之结算、账表之编制,均用四柱法”^⑦,即按照上月(或昨日)结余、本月(或本日)共收、本月(或本日)共付、本月(或本日)结余四项做各种流水簿或誉清簿的记录。例如近代滇西第一家经营外贸、金融和工商业的彝族人办的联营商号福春恒在当时就率先进行了会计制度改革,推行改良式簿记,“是采取新旧

① 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世经济研究所,1942年,U4。

② [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9~50页。

③ [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页。

④ 郭淑芳:《从“流水账”到“西式簿记”》,《武汉文史资料》1997年第4期,第89~91页。

⑤ 谢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9年,第29页。

⑥ 徐永祚:《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会计杂志》第2卷第1号,1934年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

⑦ 徐永祚:《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会计杂志》第2卷第1号,1934年1月,云南省档案馆藏。

账融合一炉的办法,避免了旧式账的含混不清,也避免了新式账的手续纷繁,适合一般的商号应用”^①。福春恒的中式改良簿记很严谨,各分号在结账时,必须将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和日记账全部呈送总号。^②这种中式改良式簿记的优点主要有:“1. 总号可以查对分号的账务有无错误或弊端; 2. 总号可以了解分号平时的资金运用情况; 3. 总号可以了解分号的开支是否正当,有无浪费。以上三点是福春恒制度中比较重要的部分。”^③此外,福春恒还将改良式簿记与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现实需要相结合,建立了“三项科目(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和日记账)呈报制度”,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传统会计制度继承和改良的关系。福春恒的中式改良簿记组织体系演绎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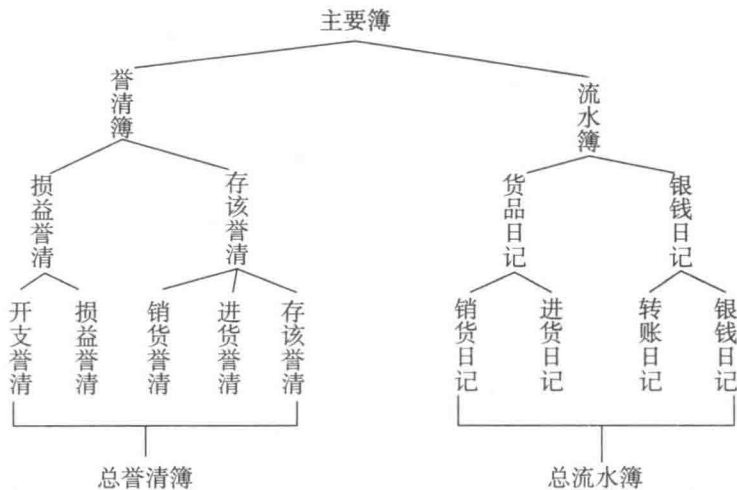


图1 福春恒商号中式改良簿记组织

除了以上的中式传统簿记、改良式中式簿记,近代云南民族地区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或部门采用了西式簿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1930年代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强力推行的会计制度变迁;二是当时一些从事金融或国际贸易的企业在工商交往中为了适应外部竞争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不得不遵循西方会计制度规则,采用借贷式西式簿记制度。与中式簿记不同,借贷式簿记体现为:一是不论借方、贷方各个科目下包含多少个账户,贷方的总金额必须与借方的总金额相等;二是账簿书写的规则是横式书写,左记借右记贷;三是以凭证为记账的依据;四是西式簿记重损益,重成本,对于每一项资产负债损益的增减都记录和计算。例如当时实行股份制的云南锡业公司所采用的就是借贷簿记制度。云锡公司的会计账簿设置为两大类,一类是资产负债类,另一类是损益及现金收支类。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云锡公司关于黄金的收支的借贷表(如表1)可以看出借贷簿记制度账户分类清楚和组织体系清晰。并且重视成本核算,“成本部分之划分,就产锡程序而论,采矿选矿冶炼次序井然,故行分步成本制度”^④,将总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生产成本又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并且,注重总算和细算兼顾,达到凭证、簿记、报表三位一体。云锡公司采用西式借贷簿记,一方面是外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为云锡公司是股份制公司,依据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制公司实行借贷簿记,在每个年终,“董事应造具营业报告书、资产负债表、财产目录、损益计算书以及公积金和股息分配议案于股东大会开会前三十日交监

① 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93年,第49页。

② 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93年,第52页。

③ 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93年,第52页。

④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云南锡业公司五周年纪念刊(1945年9月)》,载《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1990年,第473页。

察人查核。”^①另一方面是内力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近代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对大锡需求与日俱增，云南大锡生产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个旧由一个不甚起眼的边疆地区，一跃而为闻名遐迩的锡都。”^②由于国际贸易的频繁，云锡公司必须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借贷簿记制度，这样才能更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表1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云锡公司黄金收支的借贷表

摘要	借项	贷项
三十三年结存	15443629 市两	
本年结存		10013560 市两
总计	188199385 市两	188199385 市两

资料来源：根据《云南锡业公司三十四年度业务简报》中的黄金借贷表绘制。^③

从整体看，近代云南民族会计制度还是以中式簿记为主，西式簿记为辅。因为近代云南民族地区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经济属于“互惠经济”，市场制度虽然已经出现，但它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占的比重很小。互惠经济并不像市场经济那样是以利润为目的，而是与社会结构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互惠经济是以文化和习俗为基础，建立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的一种平衡的交换。”^④互惠经济对近代云南民族会计的制度演化、行动者的制度认同都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些传统的农业经济、手工作坊因为规模小和不具备会计制度变迁的环境和技术，沿袭文化惯习采用传统中式簿记；而那些规模适中的商号、票号等民族工商企业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会计制度进行调适：既保留会计文化的传统，又借鉴西方制度中的有利因素，对传统中式簿记进行帕累托式的改进，采用改良中式簿记；而少数大规模的企业，改良的中式簿记已经不利于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以它们不得不进行会计制度趋同，采用西式借贷会计制度。正如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所言，在前工业社会，经济制度镶嵌在社会体制中，经济生活为互惠或再分配的方式所笼罩，市场的交换机制还没有统治经济生活。^⑤因此，近代云南民族会计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嵌合于更大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了中体西用的特征。

三、多元复合的观念文化

缘于特定的历史变迁脉络和特定的经济地理环境，近代云南是多元民族文化汇合、冲撞、交织、融合的三岔路口，投射在会计观念文化方面体现为多元复合性。从历史变迁脉络看，清代以来，民族流动和迁徙主要朝向云南的西南部、南部、东南部，“在不断的迁移流动中，云南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流同源而又源流交错的文化特征”^⑥；从经济地理环境看，滇越铁路通车之前，茶马古道已经有东线、西线、北线、南线四个方向与内地进行商贸往来。其中北线经过富民、武定、元

① 徐百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9页。
② 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③ 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云南锡业公司三十四年度业务简报（1945年）》，载《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1990年，第527页。
④ 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6页。
⑤ Karl Polanyi,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in .”, Mark Granovetter,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Weseview Press, 1992, pp. 29 - 31.
⑥ 车文辉：《地理环境与文化生成》，《人口研究》2003年第6期。

谋渡金沙江接“灵关道”，亦称“云南路”入成都、中原地区。^①茶马古道将中原的会计观念、会计文化带到了云南边疆山地。20世纪初期，“云南自设蒙自、思茅、腾越三关后，始有正式之国际贸易。至滇越铁路通车，贸易尤繁茂”^②。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极大地改善了云南与外界的交通条件，滇越铁路也成为中国西南通向南亚、东南亚并连接世界的国际贸易通道。滇越铁路不仅改变了近代云南人的时空观念，而且引发了生产生活、经济贸易、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变迁。在会计观念方面，云南人在对外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吸纳和融入了外来的会计理念和会计价值观、会计意识、会计心理等，形成了多元复合的会计观念文化。

第一，多元财神崇拜，儒释道相融合。云南虽然地处山地，近代以来随着交通的便利和市场的开辟，云南的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尤其是省际贸易路线长且范围广。《新纂云南通志》这样形容：“云南省际贸易之途径，迤东一带与川黔交往频繁，而以昭通、曲靖为货物聚散之中心；迤南一带则与两广、上海交易，而以蒙自、个旧为货物聚散之中心；迤西一带与康藏发生交易，而以下关、丽江为货物聚散之中心；全省复以昆明为出纳之总枢纽。”^③繁荣的省际商贸离不开云南商人的长途贩运，贩运的路线不仅包括四川、贵州、西藏、广西、广东等省的区域，还覆盖到了湖南、湖北、浙江、上海、安徽、江西、山西及其他北方区域。贩运的路途路况险要，除有土匪打劫，还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风险。为了保证人和货物的安全，云南少数民族的商人一路寻求财神保佑。他们不但拜自己本族的财神，还拜沿路当地的财神，祈求各路财神保佑他们一路顺利平安。像纳西族的商人长途贩运除了供奉和朝拜本民族的神灵三多神外，也祭祀关公财神。^④

近代云南商人的财神崇拜是原始宗教的财神融合了佛教的财神、道教的财神、儒家的财神，形成了多元财神崇拜。这既是对当时艰苦的社会经贸条件的回应，也是多元复合的会计观念文化的充分体现。

第二，崇尚人伦礼俗，轻视记账凭证。会计观念作为会计主体的思想意识、精神心理、共同认知和符号体系，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作为会计文化的深层结构，其是会计主体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体系，经过历史的潜移默化渗入到每一个会计主体的精神和思维意识之中。换言之，会计观念是植根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近代云南民族地区的会计变迁主要不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内在驱动带来的重大变革，而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外力诱因。资本主义的萌芽并没有清扫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这种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礼俗互动为核心，用家族制度和宗法文化将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礼俗不但是协调社会秩序的规约，渗透到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交往以及日常生活中，而且还深入到人们的会计观念之中。像近代云南比较有名的腾冲商帮、喜洲商帮、鹤庆商帮等就是生成于宗法社会场域之中，“这些商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商帮由同一地区的商业资本家及所属商号以同族、同乡、姻亲、师徒等关系为纽带组建而成”^⑤。其会计观念文化表现为经济往来中很多是非正式的口头契约，羞于谈利，更耻于谈个人的收益；不重视正式的经济凭证，价值取向强调群体和谐。

例如大理喜洲白族商帮永昌祥商号创立于1903年，经营的沱茶、绸布、生丝远销到了西藏、上海、广州等地和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永昌祥重人情、轻凭证，“永昌祥的股东，几乎是清一色的喜洲严、杨两姓家族和他们的亲戚朋友”^⑥，“然自创立字号以来，同人均属声应气求，向来未立过合

① 余嘉华：《云南风物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② 云南通志馆：《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第343页。

③ 周钟岳：《新纂云南通志卷144·商业考二·进出口贸易》，民国三十八年印（1949年）铅印本，云南省档案馆藏。

④ 周智生：《近代纳西族、白族商人特殊塑神行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⑤ 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⑥ 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9年，第85页。

同字样。但同人固是相信于平昔”^①。当时有名的云南鹤庆商帮福春恒也有类似的观念,福春恒商号在经营管理和商贸往来中因为重人情伦理,所以“号内人员,不论是股东和职工都能视号如家,有休戚与共之感”^②。但是福春恒商号在会计文化上抱着“和为贵”的观念,与经济往来伙伴不强调契约和凭证,更看重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信任,越是关系亲密越是抹不开情面记录和保留会计凭证,甚至出现糊涂账,“福春恒与明树功经营玉石部分,多年均未结账,后来(确实年月已记不清)才由施定乾派周守正前往腾越结算”^③。不仅是永昌祥和福春恒这样大的商帮重人情、轻凭证,中小企业商人更是很多经济往来都没有原始凭证作为登录会计簿记的依据,等到分红、交税、借款时才发现账目不清,只有凭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补记账簿。由此,轻视记账凭证和崇尚礼俗人伦,体现了集体主义观念文化。

第三,仁信取义得利,疏财回馈家国。近代云南人在会计上注重以信取誉,以义得利,创造财富和管理财富都取法自天地自然,即“与天壤同数”^④,并热衷公益,将财富回馈家国。云南的鹤庆商帮恒盛公是经营印度外贸的商号,创办人张泽万在家乡的堂屋中挂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对联。^⑤其经商注重仁信和礼义,“印度售茶讲孔孟的‘仁义’之道”,因为取财于仁义,大部分的钱被印度商人挣去。也正因为这样有所舍得,恒盛公与当时印度的商号“细里”的关系非常亲密,“恒盛公与细里不但在业务上互相协作,在金融上也互相信任,信任的程度到了往来贷款只需写一普通借条,甚至可以用中文书写”^⑥。喜洲商帮永昌祥的会计理念也是义利相偕与和忠共济,永昌祥在进行商业贸易中凭的就是以信取誉和以义得利,“买卖常以期盘的形式进行,彼此赊欠经常达一年半载,不写任何票据,只凭一言为定”^⑦。永昌祥商号的后人回忆创办人严子珍时提到:“他常说他生平不做白米和食盐生意,尤为不开当铺,认为这种生意是赚穷苦人身上的钱,赚到一文都是丧阴德的事。”^⑧在《永昌祥资用底簿》的会计结算账册的首页上的序文中指出:

孔孟不言利是因趋利之心,人所共有,特以义为利示后人;不然,“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此语出诸孔子之口也,非欤?故圣贤之人利之所在,义必随之,非示人不可图利也明也……同人经商已历多年,创立永昌祥字号于云南之大理下关,分设大理府城、滇省、丽江、维西,又四川之会理、叙府等处,逮年皆协力同心,和衷共济。^⑨

近代云南商人获得财富后,大多积极地将部分利润和资本投向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投向乡里公益,而且投国家公益之所需。在大理喜洲上洪坪白族张氏家族传承下来的家族生意经《百忍传家》中的《敬告商业练习生金石良言》中第10条指出:“起盖房屋,光宗耀祖,孝敬双亲,和乡里,顾朋友,疏财仗义,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助公益,助国家,国史流芳。同人勉之。”^⑩例如永昌祥的严子珍在商号赚钱后不是忙于资本积累和增值,而是热心公益事业,其1910年的会计统计表上显示严子珍的个人资本的积累亏损了540两银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花在“如修水利、办学校、‘义仓’、

① 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9年,第47页。

② 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93年,第51页。

③ 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93年,第47页。

④ 王永海:《中国古代会计思想史论》,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年。

⑤ 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鹤庆县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19页。

⑥ 张相时:《云南恒盛公商号经营史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93年,第215页。

⑦ 陈延斌:《大理白族喜洲商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⑧ 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9年,第55页。

⑨ 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9年,第47页。

⑩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施棺’等等”^①公益事业上，体现了取之于天壤还之于天壤的会计观念。这种以信取誉、以义得利、取法自然和回馈家国的会计观念和行为带有突出的文化复合性，“‘复合’，指两个以上不同文化的诸多特质相互影响、重迭，融为一体的多元文化现象。‘复合’始则耦合，继而融合。”^②这种复合的会计观念文化是在历史变迁中多民族迁徙、流动、冲撞、交流和融合而成的。

四、结 语

卡尔·波兰尼认为：“人类经济是嵌入制度、经济及非经济的环境中。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对制度演化、经济发展的持续影响作用不容低估。”^③会计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而孤立存在。从远古时期的刻记记事和结绳记事开始，人类的会计活动就植根于其所处的文化中，会计与文化密不可分，会计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分支。会计文化是物质、制度和观念这三个层次文化要素的动态平衡和有机集合；表层是会计物质文化，是人类会计管理和会计实践所需要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是会计文化的载体；中层是制度文化，是人类会计管理和会计实践相适应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会计法规、行为准则等，制度文化充当了物质文化与观念文化的中介角色；深层是会计观念文化，是人类的会计管理和会计实践，会计主体的思想意识、会计价值观、会计观念、风俗习惯、精神心理等，观念文化是会计文化的灵魂。任何会计文化，都是受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近代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同东南亚、南亚经贸往来的交通要道，又是多民族流动、迁徙、交织、融合的文化走廊，其民族会计文化既受云南各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深受中原儒家会计文化的影响和西方会计文化的冲击，因此形成了包容性的会计文化。这种会计文化无论是在文化结构表层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等物质文化，中层的会计法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等制度文化，还是深层的价值观、会计理念、思想意识、精神心理等观念文化，都是深嵌入社会结构中，与特定的时空相关联。

近代云南的民族会计文化观念和实践是内在于社会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的，传统的惯习是会计文化变迁中调适和变革的准绳和标准，新的会计物质技术、制度因素和价值观念，在一开始都要对应到传统的惯习之中。人类学家布迪厄指出惯习是“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过程，在身体上的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④。惯习是个体或集体历史形成的性情倾向和生存图式，惯习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⑤。因此，惯习为会计文化变迁中的个体或集体提供了共享的认知地图和分类图示。当他们受到西方会计文化的冲击时，他们会知觉和评判西方的会计文化要素是否与惯习中的认知图式相适应或相冲突。如果冲突会颠覆他们关于生活意义的认知和世界的想象，他们会仍然固守传统的中式会计文化；如果西方会计文化中的一些要素与惯习中的认知图式相似或互补，他们会主动进行文化的调适，吸收西式会计文化的积极要素改良中式会计文化；当然，他们在无法控制外来文化体系冲击的局面下，有时也被迫进行制度更新，采用西式会计文化，但是这种西式会计和它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在近代云南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结合得很松散，难以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认同和接受。总体而言，近代云南会计文化并没有完成其

① 杨克诚：《永昌祥简史》，《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9年，第55页。

② 孟和乌力吉：《观念文化的变迁与环境意识的重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2期。

③ [匈]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④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⑤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